

人性追望
世态炎凉

苹果不明白,她这么踏实的一个人,怎么找了张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?

他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!毕业的时候他去一家大公司实习,公司想留他,只是底薪给得低些,他觉得人家大材小用,忍气吞声干了一个月便辞职了。接着有朋友介绍张凯去一家公司当销售,干了没几天,一天陪客户喝酒时,客户说了些难听话,张凯愤而离席,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公司。

然后他说不去上班了,要创业,于是向家里人借钱和几个同学在大学宿舍划出一块地方当办公室。他折腾了

02 苹果的烦恼

小半年,几万块钱花光了,家里怨声载道,事业也没能做起来。接着他又说要考研,买了一堆材料在家复习。

苹果本来觉得这也是个希望,他是学化学的,能往上走一走,或者出国,或者留校,或者找个好企业做个技术管理,都相当不错。没想到复习了半年,他说现在硕士生成把抓,考研没有什么意思,不考了。那一次,苹果和他大吵了一架,两个人差点儿分手。

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感情危机。张凯苦劝了苹果很多天,保证自己不再好高骛远,一定脚踏实地寻找工作,苹果这才勉强回心转意。苹果有时候想,如果那次她跟张凯分手了,倒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

那个时候苹果25岁,虽不貌美,却还青春,一些大姐还挺热心地帮她张罗对象。还有一两个闺蜜,觉得张凯不踏实,劝她和张凯分手,但苹果一直不为所动。

张凯那段时间表现也不错。他找了家公司,做医药产品的销售工作。张凯跑了约一年的医院,这是他愤怒的一年,他说现在做药的人没有良心,卖药的人更没有良心,最没有良心的,是医生给病人开药的时候。有一次张凯对苹果说,如果没有你,我是不可能妥协的。

苹果闻言一愣:“你向什么妥协?”张凯也愣了。是啊,他向什么妥协呢?他不得而知。他知道对于苹果和苹果的家人、朋友来说,他就是个混

账。在现在的社会,一个男人不能挣钱养家,几乎等于十恶不赦。就算他对苹果忠诚,打心眼里爱着这个女孩,他们也不会感激他。他们要的是实际效果:他一年挣多少钱、买多大的房、开什么样的车、造就什么样的生活。

那一年,苹果和张凯也有吵闹,吵闹的原因很简单:苹果26岁了,到了结婚年龄。可他们拿什么结婚呢?现在有个词正流行:裸婚!即无房、无车、无钱就结了。可四年前这个词没有出现,裸婚是不可想象的。

每当苹果和张凯商量这个事,张凯总是说:“好啊,想结婚明天就去。”可最后退缩的往往是苹果自己。她和同事商量,同事的意见和朋友、家人的意见并无区别:你为什么要嫁一个这样的人呢?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呢?还是和他分手吧,趁着自己年轻。

苹果的妈妈,一直以为苹果和张凯大闹过后就分手了。她除了通过电话催苹果尽快找人之外,就是通过各种渠道、各种关系托人给苹果介绍对象。除了一两个闺蜜可以诉苦外,苹果别无他法,闺蜜们最后也厌烦了她的倾诉,因为她和张凯要分不开,要结也结不了。

于是,日子一天一天耗下去了。张凯再一次辞职,再一次找工作,再一次失业。渐渐地苹果的闺蜜们开始催着苹果赶紧与张凯结婚,熟悉苹果感情心路的同事也催着苹果赶紧结婚。苹果的妈妈除了变本加厉催

她赶紧找人,也开始怀疑苹果和张凯藕断丝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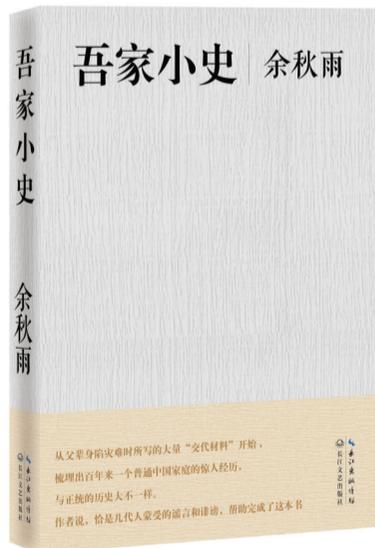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苹果的妈妈小心翼翼地:“如果你还要喜欢那个人,你结婚我们也不反对。”这种一边倒的话,让苹果觉得悲哀。

时光过得太快了,苹果已经29岁了,再有一年,她就30岁了,可她两手空空,一无所有。这些年来,她一个人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用,虽积攒了一些钱,用这些钱买一辆小车还可以,买房就想都不要想了。如果她和张凯结婚,再生下一个孩子,难道要她一个人负担一家三口的全部费用吗?苹果想都不敢想啊!

结婚是不可能了,那就赶紧分吧,可这时候连劝她分的人都没有了。29岁的大龄剩女,容貌一般、无房无车,不好“兜售”啊。

那些劝她分的人开始把她往爱情的路上引,什么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啊,女主外,男主内;什么你们从大学到现在谈了七八年,真是很不容易啊;什么感情和实际利益能得一样就不错了——苹果感到奇怪,这些话他们为什么早不说,到现在才来说?而且,女主外、男主内,说起来是不错,可苹果根本做不了女强人。在报社工作这么多年了,她还是有些腼腆,虽然有时候说话风风火火,写起稿子来也算得心应手。如果要她离开这个报社,她一点方向都没有。

(摘自《求职游戏》作者 崔曼莉)



自家小史
娓娓道来

一天,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。他告诉我,有一个城市,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脚步来争吵,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,而且那里也没有几个文化人,根本不会在乎你们。那个城市,就是深圳。

我一听,不会再有攻击,再有排挤,那该多好!于是,我和马兰决定立即动

08 再遇“啃余族”

身去深圳。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,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,不久,把岳父、岳母也接去了。

在深圳,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,不用上班,就把精力全部用在房子装修上。

马兰不是话剧演员、京剧演员、歌剧演员,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。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,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,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。她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,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,就是做一个工人也可以。

一天晚上,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,我急忙去接,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:“他们太厉害了,你逃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找到!他们现在在报纸上指责你,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,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。”

我一听马上直起身来,问:“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我?”

“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,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,姓肖,好像在一个杂志社做编辑。”杨长勋说。

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。这事,不仅仅是在骂我,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。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不知道,但是

如果我不出来澄清,深圳市政府蒙了冤,一定会迁怒于我们。那么一来,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?

因此,我百般无奈,委托北京一位律师打官司,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深圳市政府的寸土片瓦,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。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,说北京的法院判了,我败诉。

我又上诉到中级法院,又败诉。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,好像是在维护“言论自由”,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。

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,说“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,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”。但是,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。

这天,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,她的神色十分忧郁。她说几天前在父母的垫被底下看到一沓诽谤我的报纸。她想安慰他们,但说了几天都没用。在他们心目中,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“政府喉舌”“中央文件”,报纸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,其实就是要“打倒”这个人。

女儿被驱逐,女婿被打倒,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。岳父浑身无力,岳母通宵失眠。

为了老人少受一点惊扰,我下决心

不再写书了。只要我写书,就会产生学术影响,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新一轮围攻。

不写书了,也就不想读书了。我就铺开宣纸,开始写毛笔字。

马兰天天站在一边,看着我写毛笔字。

这情景,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酸楚。

我和马兰只想干干净净、安安静静地从事一些艺术文化工作,从来没有想到招谁惹谁,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,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寸步难行。

有时,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。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,那摇篮就挂在水边的屋檐下。

我看着她,想起她出生在一个“右派分子”的家庭,从小受尽了冷眼,对周围人的点滴善良她都会分外感激。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,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。

我初次见到她,是观看她演莎士比亚悲剧,我被她的表演所折服。但是,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,是她那惊人的善良。

(摘自《吾家小史》作者 余秋雨)